

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批判论

周志山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话语在 20 世纪的思想家中引人注目, 它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渊源引起了人们的诸多争论。这种争论表明, 划定两者之间的界限非常重要, 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阐扬马克思的以实践为基点、以社会关系为视域的社会批判理论仍具有当代意义。

关键词: 卢卡奇; 物化; 马克思; 社会关系; 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09)02-0058-06

选取卢卡奇以物化为核心范畴的批判话语与马克思以社会关系为基本视域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一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因为: 一方面, 由于卢卡奇以物化为核心范畴的现代性批判是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作的进一步丰富和阐释, 并成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汲取思想灵感的丰富源泉; 另一方面, 又由于卢卡奇的批判理论是“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 进而用来回击当时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所作的实证主义解说的, 因而受到了黑格尔哲学“前视域”的影响和束缚, 并使其物化批判理论缺失了马克思实践批判和社会关系批判的科学视域。笔者认为, 分析其中的理论得失, 对阐扬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批判论仍然具有当代意义。

一、物化: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范畴及其特征

卢卡奇是通过韦伯、席美尔等人的物化理论, 特别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学

说的研究而形成关于物化和物化意识理论的, 这一理论旨在对工业社会和技术理性统治下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展开批判。物化理论的深刻性在于, 它把古典经济学家视作经济学范畴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结构, 概括为现代人类社会的普遍形式, 并力求将它提升为一个透视现代人整个社会生活的哲学历史观范畴, 它深刻地反映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理性化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因此, 卢卡奇物化理论所要阐述的首要问题便是, 商品形式的普遍性是如何制约着人们在商品中对象化了的人类劳动的抽象, 换言之, 这种可以通过量化加以比较的抽象的、同质的劳动形式, 是如何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式, 从而对人们全部社会关系的对象性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客观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有主观形态——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果借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简洁表达, 那就是, “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 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1] 56}

在卢卡奇看来, 物化现象作为“商品结构的本质”, 之所以成为统治和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普遍形式, 首先是因为商品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所具

* 收稿日期: 2008-10-16

作者简介: 周志山(1963—), 男, 浙江兰溪人,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建构”(06MLZB07ZD)

有的无限扩张和渗透的本性使然。他认为,以物质需求和交换价值为追逐对象的商品生产,具有无限扩张和渗透的经济本性,它力求“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体系”。^{[2] 392-393}这种全面的经济渗透,使得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都按照客观的经济法则,按照商品的交换原则来“塑造”,并使其统统转化为商品货币关系,从而导致社会关系普遍地物性化。

值得指出的是,卢卡奇把对商品经济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物性化过程的分析,与资本主义思想启蒙运动所标举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所期待建立的严格秩序化、规则化的理性原则联系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出发,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从而使他对物化理论的阐释与对工业化社会的现代性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问题的阐述更深刻和透辟。在他看来,近代理性主义形式体系及其内在矛盾,同整个现代性生产的本质矛盾是内在于同一的,“近代理性主义形式体系……无非是对近代社会状况所作的逻辑的、系统的阐述而已”。^{[3] 200}

那么,什么是卢卡奇所说的物化?他又是怎样揭示物化的基本特征的呢?

卢卡奇说,所谓物化,就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3] 147}换言之,物化特指的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结构成为社会的普遍形式和支配原则,从而使人的活动及其结果成为某种自律的、并反过来统治和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借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表达就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可见,物化与商品经济的结构本性和工业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在本质上是内在一致的。

由此,卢卡奇的物化现象可进一步概括为如

下基本特征。

首先,物化具有自律性的特征。这是物化现象的最显著特征,它表现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变成某种独立和外在的力量,并反过来统治和支配人及其行为。卢卡奇将这一独立外在的力量称为“第二自然”。“第二自然”这一说法本身就意味着人的活动及其创造物的“不由自主性”,它以其独立于、外在于人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反过来支配和主宰人的活动。物化世界的这种客观自律性,使得人们在作为自己活动结果的社会存在客体当中,失去了作为主体的自主意识和活动自由,人们只能像对待“第一自然”那样以直观的、抽象反思的方式来把握这些客体及其规律。卢卡奇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待“自在之物”的不可知论立场,恰好是反映了现代资本和商品经济社会难以克服和无法理性把握的物化状态,从而不可避免地把社会生活的总体性问题禁锢在知性所不可把握的非理性之中。卢卡奇由此把商品时代社会生活中的物化现象,提升、概括到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高度,这种提升和概括确实独具特色、颇为深刻。

其次,物化具有反主体性特征。商品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凝结,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本来应该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主体性的确证,但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绝对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遵循着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优先于人本身发展的原则,以商品为表现载体的这种物的力量实际上却成为人本身的否定形式——人为物役。这便是物化的反主体性特征。这种人—物关系的颠倒,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2] 200}卢卡奇说,尽管“资产阶级赋予个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同时,这个人却被它所隶属的经济条件所扼杀了,被商品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物化所毁灭了”。^{[3] 70}

再次,人们对物化现象的非批判性特征。卢卡奇认为,生活在物化世界中的人们之所以会失去对物化现象的批判能力,是因为物化已成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

接和普遍的现实。物化现象的这种现实普遍性,使得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命运;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使得全社会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商品原则和物化结构之命运。物化不仅成为一种统治者、支配人的外在力量存在于人的生存结构和活动方式之中,而且已经积淀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并内化为物化意识,以致于人们自觉地和批判地认同了这种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并将这种物化结构当作外在的规律和作为人的本然命运来加以遵循和服从,从而失去了批判和超越物化结构的主体性维度。

二、物化的扬弃: 卢卡奇社会批判理论的二重性分析

对卢卡奇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矛盾二重性分析,可概括地表述为以下两点: 1. 卢卡奇以物化为核心范畴的现代性批判,是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作的新的诠释和解读,其直接目的是反击当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所作的、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近代式解读,但黑格尔的“前视域”又使卢卡奇缺失马克思以社会实践为基点的社会批判路径。2. 卢卡奇对工业文明进程中技术理性所作的批判,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先河,但韦伯、席美尔等人的物化逻辑的理论渊源又使他缺失了马克思以社会关系为基本视域的社会批判维度。

首先,卢卡奇以物化为核心范畴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现实的和理论的双重诉求或指向。其现实指向,就是为了总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期寻求变革现实社会的可能性和生长点,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寻求出路;其理论指向,则是为了回击或对抗当时第二国际理论家基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带有经济决定论立场的近代性解读。

具体说来,卢卡奇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批判,集中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者把作为社会批判学说的辩证法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累赘,主张用一种理想的认识方法——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对抗辩证法的强制结构。卢卡奇对

此批判道,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庸俗唯物主义者由于忽视了自然科学方法产生的这一社会基础,以致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质降低为关于自然客体和自然规律的机械决定论立场,从而把自己的理论降低为资产阶级的水平,成为资产阶级麻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实证式理解,是一种粗陋的、非历史的和无批判的唯物主义抽象教条,其要害在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拜物教意识、社会关系物化形态的直接认同乃至同流合污,“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成‘科学’的不变的基础”,它“模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3]55}

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科学主义,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纯粹自然规律运动的过程,片面地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并把它看成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忽视了思想和政治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一切能动性和创造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卢卡奇对此提出,必须把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在内的“总体性革命”。这种以总体性为核心、以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主线而展开的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所作的批判,有力地回击了庸俗唯物主义者采用科学主义的立场而抛弃马克思革命辩证法的错误。

然而我们又遗憾地看到,卢卡奇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所作的批判是依照黑格尔的方式来进行的,是想通过复活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黑格尔因素为基本视域的。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我一直是根据我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阅读马克思的。”^{[3]34}可以说,如何以黑格尔的哲学为构架,把它链接到马克思的哲学当中,并从中找到阶级意识的生长点,构成了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理论主题。这种以黑格尔哲学视域统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式,虽然激活和开辟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路径,但这种激活和超越是在黑格尔的反射镜中实现的,它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主观主义的色彩和浪漫主义的方向,明显地带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理论情结和价值定向。显然,卢卡奇的物

化批判理论缺失了马克思基于感性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批判路径。

其次,以物化为核心范畴的批判话语,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卢卡奇深入到文化层面对技术理性在当代西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先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和社会文化批判,诸如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萨特的历史人学理论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他那里汲取了灵感,卢卡奇也因此奠定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就是要揭示商品形式的这种普遍性是如何制约在商品中对象化了的人类劳动的抽象,而这种抽象的、机械的、可精确量化和计算的劳动,又如何进一步成为深入到现代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普照之光”,成为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甚至嵌入到大众文化、学术研究或官僚的内心世界,从而对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对象性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在评述泰罗制的现代性特征时,卢卡奇说道:“随着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征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3] 149}这种敌视生活的机械论原则,以及与生活格格不入的科学形式主义,也正好应合了马克思关于现代自然科学本质的基本判断,即“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1] 128}

但同时又应该看到,卢卡奇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依然带有黑格尔的哲学语境以及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物化理论逻辑。我们知道,在黑格尔那里,物化、对象化、外化和异化均是在同一层面上而且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的,不过黑格尔的物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是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设定的抽象之物,而不是现实的物,其实质无非是“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3] 176}同样,卢卡奇也是在没有区分物化和异化的前提下,并且是在否

定的意义上使用物化概念的,他所提出的物化的自律性特征和反主体性特征,正是在黑格尔“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即“第二自然”的意义上概括出来的。同时,更为深层的分析渊源在于,卢卡奇技术理性批判中的量化和可计算性话语是取自于、并且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韦伯关于工业文明对象化技术进程中的合理化思想的。“这已经不是直接面对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关系物化,而是在反对韦伯眼中物质生产对象化过程‘祛魅’的量化、标准化和世俗化进程”,“马克思对物役性物化的分析是从生产关系着眼的,而韦伯则是从生产力本身入手的”。^[5]显然,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话语在这里又缺失了马克思基于社会关系维度的分析视域。

三、实践和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点和视域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贯穿于他一生的理论著述和实践活动中,以“批判”命名而撰写的哲学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尽管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话语背景十分复杂,但其批判理论的思想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从早期对宗教、法和政治国家的合“理性”批判到后来对市民社会关系的现实性批判;从原先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到后来的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一个演进过程。与之相适应,其批判学说的理论渊源和批判对象,也先后经历了从以黑格尔理性世界观为基点的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到以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为基点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再到以实践为基点、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本视域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点、以社会关系为基本视域的。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立足点是社会实践。实践基点的确立,不仅使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扬弃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批判观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宗教异化批判观的抽象性质,而且也为社会关系批判视域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因为从两者之间的关系上看,实践就是一种创建

和变革社会关系的活动。实践批判也就是一种改造和重建社会关系的活动,实践批判的实质乃是社会关系批判。

所谓社会关系批判论,就是以现实社会关系的总体性矛盾为视域,通过对这一矛盾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考察,来引向对其作实际变革和改造的实践要求。为了叙述的简便,这里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观的批判为例作一简要说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只是把宗教归结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他无法指认宗教异化所包含的世俗社会本身的自我异化,他对宗教的批判依然局限在理性批判的视域中;而马克思则把宗教的批判归结为对世俗社会的批判,并通过彻底的现实尘世社会的批判来为彻底的宗教理性批判奠基。马克思将宗教的批判诉诸于社会的批判,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揭示出被费尔巴哈人本学所掩盖着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性本质,而只有深入到人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一生存境况中,一切社会批判才真正具有现实的冲击力。

由此,我们可将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批判论作如下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马克思首先正确地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形态:其一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上的物化”,即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对自然的占有。这种物化实际上就是生产劳动的对象化,是人类主体通过具体生产劳动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极过程。这是一种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物化,表现为“工业”和“自然科学的运用”。对于这种物化,马克思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其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2]176}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交换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它只有在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中才突出地表现出来,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利,使得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社会关系也就转化为人对物的占有关系,其实质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和“关系”反过来奴役人。显然,马克思的物化批判话语主要针对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也即对物化社会关系的批判。

第二,物化社会关系必须通过“现实的个人”表现出来,它使得“现实的个人”表现为经济化的人格或人格化了的物,人仅仅作作为一种抽象的经济职能的承载者——工人作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是人格化了的劳动时间;资本家作为资本职能的执行人,是人格化了的资本——而存在。而“现实的个人”作为物化社会关系的人格化,又特别地体现在“拜物教”的观念当中,这就是“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6]202}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陷入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迷雾中,就是因为他们仅仅把“资本理解为物,而没有理解为关系”,^{[2]212}也没有理解货币原来是“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103}没有理解“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2]85}更没有把个人理解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和“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7]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拜物教迷雾的根源,正是把物化社会关系遮蔽起来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社会关系批判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拨开资产阶级社会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迷雾,唤醒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变革、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自觉性和主体性。

第三,由于物化社会关系对于人的感性活动和人的积极生成具有外在性、独立性和异己性特征,人反而受自己创造的物化社会关系的“抽象统治”。这种抽象统治的现实表现,就在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6]360}工人的活劳动受到自己先前创造的生活条件(即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的支配。而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死劳动)之间这种主—客体关系的颠倒,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资关系得以存续的基本条件。马克思社会关系批判理论对这一颠倒了的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揭露,其目的就是为了批判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存在的这种反主体性和历史暂时性。

第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物化现象的批判, 不是出于道德上的义愤和谴责, 不是一种基于伦理学或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价值批判, 尽管这种批判确实包含着人道主义的价值指向, 但这种价值批判必须置于历史评判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认为, 虽然以商品、货币、资本等为载体的这些物化社会关系, 消灭和否定了人的一切个性和一切“作为人的关系”, 使之量化为抽象的、同质性的货币数量关系, 带来了人们“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 但这种物化社会关系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因为“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 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2] 108-110}它在形成物化社会关系的同时, 也“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2] 104}而“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 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不是自然的产物, 而是历史的产物”, 物化社会关系产生的历史重要性, 还在于这些关系本身同时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 成为“突破它自身的条件”和新

社会关系的诞生地。^{[2] 107-108}总之, 社会关系的物化及其进展与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与物化社会关系的逐步扬弃走的都是同一条道路。

可见, 一定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的基本视域, 物化社会关系中“本质的矛盾”是马克思解剖政治经济学从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对象, 而科学的历史评判机制则是他克服早期理想的浪漫主义批判观的思想武器。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批判论对于当代人寻求扬弃物化、克服社会关系的异己性和实现人的解放之路仍具有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3]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1.
- [5] 张一兵. 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J]. 哲学研究, 2000(8): 36-43.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01.

Lukác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Marx's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Relations

ZHOU Zhi-shan

(College of Law,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Lukács is noticeable among thinkers of 20th century for his theory of reification. It has aroused great controversies o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with Marx'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These controversies indicate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m. On this basis, it still ha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elaborating on Marx'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which is based on praxis and which focuses on social relations.

Key words Lukács; reification; Marx; social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吴月芽)